

从中唐服饰风尚看韩孟诗派与元白诗派

何昶熠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19)

摘要: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是盛唐和中唐政治经济的分水岭,也是诗歌的分水岭,中唐的诗歌展现了完全不同于盛唐诗歌的风貌,先是经历了以大历诗风为代表的过渡期,随着渴望中兴的改革观念的崛起,诗歌也寻找到了自己的新方向,出现了以怪奇为特征的韩孟诗派和以尚实为特征的元白诗派,这些诗派的产生有着这个特定时代文化土壤的影响,可以通过文化的另一个视角——服饰,在中唐出现的特色为出发点,探求另一种中唐文化的代表——中唐时期的韩孟、元白诗歌流派,所能够产生和发展壮大的文化风尚原因,能对这两个诗派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进而了解中唐的时代特色与审美情趣。

关键词:中唐服饰;韩孟诗派;元白诗派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6)03-0082-04

The Analysis of Han Meng Poem School and Yuan Bai Poem School through Clothes Style in Mid-Tang Dynasty

HE Chang-yi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An Lushan Rebellion is not only the boundary of glorious age of Tang and mid-Tang dynasty, but also that of poems. The poems in mid-Tang dynasty a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glorious age of Tang. At first, represented by the style of Dali period of transition, then along with the rise of reform ideas which called for resurgence, poetry also found its new direction. Therefore, Han Meng Poem School which characterized with "strange" and Yuan Bai Poem School which sought for "real" sprung up. The birth of these two groups has their own cultural reasons. Through another perspective of culture, costumes, in the tang dynasty, set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in Mid Tang dynasty as a starting point so as to analyze the cultural reason why the two school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nother kind of culture in Mid Tang era, are able to develop as well as become thriving. Thus the paper enables u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m, and then get to know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esthetic temperament and interest of this particular era.

Key words: clothes style in mid-Tang dynasty; Han Meng Poem School; Yuan Bai Poem School

一、中唐女服文化举隅

(一)回鹘服

回鹘服主要流行于中晚唐时期。回鹘是维吾尔族的前身,是少数民族的强势政权之一,一直以来与唐朝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安史之乱时期,李亨得到了回鹘的帮助,更加促进了双方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使得回鹘的习俗也逐渐渗入到了中原文化中,而回鹘服在中唐时期能够盛行,与唐朝和回鹘的良好交流不无关系。

回鹘服尤其在贵妇和宫廷妇女中流行。回鹘服略似男子的长袍,翻领,袖子窄小但下身宽大,下

长拖地。颜色艳丽,尤其以红色等暖色调为主。材料大多使用质地厚实的织锦,领、袖均镶有宽阔的织金锦的花边。穿上这种衣服,通常将头发绾成椎状的髻,称为回鹘髻。髻上另带一顶缀满珠玉的桃形金冠,上缀凤鸟。两髻一般还插有簪钗,耳边及颈配有精美的首饰。足穿翘头软锦鞋。回鹘服华丽鲜艳,配饰极尽装饰,与中唐时期,人们还沉浸在安史之乱所带给的伤痛的气氛格格不入,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回鹘习俗因为交流频繁在中原地区的渗入,也与唐朝妇女寻求独立地位的思想观念有关系,唐朝妇女个性独立,对于外来文化有着敏锐的嗅觉,并敢于学习与吸收,充分显示出有

唐一代包容兼俱的特色。

中唐的女性不断感受着国家由盛到衰的浓浓秋意,她们对于男性的崇拜也随后逐渐转向了对少数民族强势权力的崇拜,回鹘作为少数民族的强势政权,并对唐朝在安史之乱中给予帮助,中唐女性对于这种强势权力的向往,也就通过服饰和配饰反映出来了。

(二)女服样式向宽博化的转变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分界线,中唐和盛唐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尚。在服饰风尚上,中唐的服饰又开始向宽博化、装饰化转变,衣衫逐渐加宽,袖子也越来越宽大,淮南观察史李德裕曾经提到过“管内妇人,衣袖先阔四尺”的情况,元稹也在《叙诗乐天书》中写到:“近世妇人晕淡眉目,倂约头鬟,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这种衣袖的宽博使服装走向了装饰化的道路。盛唐时期,胡服的盛行,一方面是中原与胡人密切交流,胡文化在服饰上的逐渐渗透,加之唐朝始终持有兼容并蓄的文化观念的产物,另一方面,胡服大多为窄衣衿袖,对于女性来说适合劳作与活动,使得胡服适用于这种劳动需求而盛行起来。中唐对于胡服的摒弃,衣袖向宽博化的转变,都体现出了在这个时代在服饰上装饰化的倾向。

而这种装饰化的倾向与中唐时统治者以俭制奢,渴望中兴的政治需求是相悖的,唐文宗于大和六年下诏令:“妇人裙不过五幅,曳地不过三寸,褙袖不过一尺五寸。”但是世风所致,风气很难改变,最后不得不放宽至二尺。

(三)时世妆

在妆容上,中唐时期也显示出了一定的变化。有唐一代,妆容在不同的时期也显示出不同的特色。初唐时期较为朴素,化妆仅涂粉、描眉,盛唐时期则展现出国家处于鼎盛时期兼容并受的状态:着胡妆的妇女眉间有黄星花钿,颊边作二星月牙样子或更在二颊间加两小点胭脂,与胡服配成一套。着裙装的妇女,多长眉细目,高髻插小梳,三五不等。而元和时期的妆容则体现出一种怪异之风,这种妆容在白居易的《时世妆》中就有叙述: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

整个妆容呈现出一种怪异的色彩,又叫做“啼妆”:不施朱施粉,以乌膏注唇,作八字眉,赭面、圆鬟、无鬓、堆髻,白居易发出了“非华风”的感叹。

而这种妆容与中唐时期盛行的回鹘服相匹配时,更显得格格不入:回鹘服颜色鲜艳华丽,而元和时期的时世妆“妆成尽似含悲啼”;回鹘服略似男子的长袍,而时世妆的八字眉却显示出女性娇弱委屈的一面;回鹘服以暖色调为主,而时世妆却喜乌唇。服饰体现出一种对于少数民族强势权利的崇拜,而妆容则体现出了一种惹人怜爱的病态美。

这种具有病态美妆容的出现,反映出中唐时期人们对于朝政的失望,失去了盛唐时期昂扬向上的积极乐观,反映在妆容上则体现出一种颓废的病态美。此外,盛唐各式各样的配饰、发髻样式、妆容样式也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国家在经历安史之乱后走向了下坡路,妆容所体现出的美也出现了消极的色彩。

毋庸置疑,这种病态颓废的妆容是不符合整个国家改革弊政、渴望中兴的社会潮流的,唐文宗对女子的妆容进行了一些规定:

“妇人衣青碧纈,平头小花草绿履、彩帛曼成履,而禁高髻、险妆、去眉、开额及吴越高头草履”^{[15]32}。

然而就像是不能力挽国力每况愈下的状况一样,文宗政令的下达并没有改变这种妆容的消失,世风所行,这种颓废美在晚唐更为盛行,显示了整个国家所弥漫的矫饰、病态的日益衰败的景象。

二、中唐尚怪奇、尚俗尽的诗歌风尚

唐代诗歌是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巅峰。自陈子昂确立了“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的诗歌走向后,加之张若虚等人的对诗歌意境的创造,终于成就了健康瑰丽的盛唐诗歌。而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使唐朝的政治、经济都走向了下坡路,成为盛唐和中唐的分水岭,而诗歌也失去了盛唐“神来、气来、情来”的气质,而转向了另一种风尚,仿佛由少年情怀转向了精神风韵。

在盛唐和中唐之间,产生了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以大历诗风为代表,“气骨顿衰是当时创作中最为普遍的表现,是大量诗歌缺乏浓烈情思,缺乏强烈爱憎,情思冲淡以至平淡,究其原因,就在于从这些诗里,诗人对人生采取了无可奈何的态度,既没有盛唐诗人那种建功立业的强烈追求,也并非完全隔绝人世,摒弃七情六欲,不即不离,淡然处之”^{[21]35}。

这个时期的诗歌开始追求高情、丽辞、远韵,开

始在诗歌里表现孤淡闲远的情绪特征,追求意象的省静。大历年间的诗人大都经历了安史之乱,他们在少年时期感受着盛唐带给他们的昂扬向上的社会风气,又在中年时期感受到中唐筚路蓝缕,百废待兴的面貌,这种时代的落差使得他们更愿意逃避现实生活,追求宁静闲适的生活情调。“这个时期的文学思想倾向不是盛唐那种高扬情调和风貌,不是那种理想主义风骨说,而表现出一种过渡的特点,它好想要衔接它之前,又好像开启他之后”^{[21]30}。这个时期主要探求诗的艺术形式,而对于诗歌内容的探索,则要交给之后的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和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韩愈、柳宗元发起了浩浩荡荡的古文运动,主张“文以明道”,不平则鸣的散文理论主张,在诗歌上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理论主张,但是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却出现了尚怪奇的特色。首先,以韩愈为代表的韩孟诗派或是选取世俗生活中不常有的事物,将其引入诗歌,或是将事物进行变形,使其变得怪异奇特。其次,他们在作诗时加入了自己奇特的想象,选取能够产生强烈对比的色彩,选材怪僻、构词异样。此外,韩愈还以文为诗,打破诗的原有节奏,以散文化的句式入诗,这种散文化的句法入诗,不仅打破了诗歌的韵律美,而且使得诗歌打破了“诗缘情”的传统,使得诗歌带有了更多叙述和议论的色彩,将高度浓缩的情感跳跃变为平白直叙的铺陈。另外,韩愈在古文运动提出的“不平则鸣”的理论主张也将其运用在诗歌中,使得他们的诗歌也充满着强烈的主观色彩,他的诗歌也只是书写“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上宰相书),使诗歌出现了尚主观的倾向。韩孟诗派的创作,使得诗歌既不像是盛唐诗歌讲求意境的创造,也不似中唐诗歌崇尚冲淡闲远的情趣。

这种尚怪奇、尚主观的风尚的产生并不是没有原因,它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有着密切的联系,以时世妆为例,时世妆的妆容不同于盛唐时期的妆容,盛唐时期的妆容以“红妆”为主,此妆容主要由铅粉和胭脂为主,而到中唐,则开始流行“腮不施朱面无粉”的妆容,与先前的流行异趣,而且喜用乌膏注唇,流行八字眉,使得妆容更加的怪异。而回鹘装的流行,则又在潜意识里体现出妇女对于强势权利的崇拜心理,以至于在选择服装样式时更加的带有主观色彩。另外,中唐对于“胡化”的排斥,服饰向中原传统的复归,都其实是他们民族心理的作用,是他们的主观选择。而韩孟诗派的尚怪奇、尚主观的诗歌特色与当时的文化环境产生了完美的契合

关系,也可以看做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下的产物。

安史之乱虽然以唐王朝的胜利而告终,但是却同时也给唐王朝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朝野上下都希望能够吸取教训,改革弊政来达到中兴的局面。在这种诉求的引领下,白居易、元稹沿着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道路用诗歌来反映社会状况,以达到“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愿望。以白居易和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诗歌理论的实质,是完全处于功利的目的,他们在诗歌中强调义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做”,将诗歌的发展引向了一条重功利的道路,与这种理念相对应,他们的诗歌失去了对于意境和韵味的追求,而重在义理的表述,“张籍和王建”在追求通俗时,仍保存着民歌的韵味,仍有含蓄。白居易在尚实的创作倾向中,他在写法上还务求倾盘而出,把话说尽,不留余韵”^{[22]47}。这种创作倾向使得诗歌摒弃了盛唐诗歌的写法,出现了尚俗、尚尽的特色,这种特色在白居易晚年的诗歌中仍然是其主要创作倾向,他在退居官场后所做的那些闲适诗,都热衷于铺叙身边的琐事,将衣食俸禄挂在嘴边,苏轼曾经评价“元轻白俗”就是指白居易这方面的内容。

同样,在中唐女服中也显露出相应的特色,中唐的女服向中原传统服饰的复归,一方面可以看做是排斥“胡化”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受到了整个社会风气尚实的影响,女服顺应朝廷的需求,开始在服装上强化儒家伦理观念,不仅重新强调在服装样式上向传统中原文华的复归,对于尺寸,不同等级的服装样式以及颜色都进行了规范,这和他们希望借助儒家之道来达到王朝中兴的希冀是一样的。然而,女服虽然体现出向传统服饰的复归,但又重新出现了尚尽的特点,他们开始将服装变得极其宽大,甚至造成了行动的不便,对于布料的使用量也就大大提高,这和以俭治国的方针是不符合的,文宗即位后对这种服饰的尺寸进行了规定,但这种潮流已经蔚然成风,使得“诏下,人多怨者”。唐代服装捕捉到了社会需求的嗅觉,对自身进行了改变,而元白诗派的出现也可以看做是这种尚实、尚俗尽文化在文学领域的一个缩影。

三、结语

中唐与盛唐诗歌展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风貌,“从凭才性写诗,从随意发挥抒情性,到刻意推敲,以功力写诗,这在创作思想上是一个极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当然有面向人生的写作思想有关,既然

从理想走向现实,自然也从潇洒走向苦学”^{[2][3]}。元白诗派的出现是当时渴望中兴,复归国立强盛经济繁荣的社会理想的产物,而韩孟诗派的诗歌却丝毫表现不出儒家重功利色彩的倾向,韩愈并不将文章和诗歌放在同样的地位,也使得韩愈的诗歌展现出完全不同于唐代诗坛和元白诗派的审美情趣。而我们可以从服装风尚的变化,探求这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从而窥测出当时的社会风尚对于这两个诗派在主张和创作倾向方面的影响。

这种社会风尚使得中唐的诗坛出现了尚主观、尚俗尚尽的特色,但经历了昙花一现般的“元和中兴”后,唐朝的国力越来越衰弱,人们对朝政失去了希望,在服饰风尚中沿着中唐宽大衣衫的潮流继续发展,甚至到了怪异的地步,妆容中“血晕妆”和“三白妆”更是显示出一种颓废的病态美,显示出一个

朝代即将末路的变态审美情趣,而在诗坛中也体现出末世文学的创作倾向,尚实、尚俗尽的审美取向失去了自己的市场,虽然也有部分诗人学韩愈的怪奇雄杰,但这个时代主要的创作倾向开始转向个人情思,传达一种细美幽约的美,他们着眼于内心世界,也同时开始追求诗歌的炼字炼句,出现了苦吟派,所表现的内容既没有盛唐的积极向上,也没有中唐的重功利,完全是在自己狭小范围内的吟唱,将诗歌的发展引向了一个狭窄的道路,失去了原有的风采。

服饰如此,文学也如此,唐代服饰的变迁,与诗歌创作倾向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她们都是社会文化的一角,都可以展现时代的某种变化,而同时也可以借助服饰,来更好地理解诗歌风尚产生的原因与背景,只不过服饰更加直观和平民化一些。

参考文献:

- [1]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24[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责任编辑:董应龙)

(上接第76页)

因此加强安全监管工作刻不容缓。在安全生产领域,由于历史问题和监管体制的固有缺陷,事故调查组和综合监管的制度设计也存在重大问题,使得在推进安全监管的法治化任务艰巨。因此我们需要提高重视,注重在顶层制度设计环节强化对安全监管的制度设计,以期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虽然实现安全生产立法的科学化、规范化与法治化不可能一蹴而成,在安全生产法制建设的许多环节上改革的困难程度超乎想象,但是笔者相信,只要能够在实现安全生产监管的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把握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关键点,实现安全监管领域的良法之治就不是一句空话。

参考文献:

- [1] 石少华.明确职责,理顺关系,齐抓共管——论安全生产的综合监管和专项监管[J].北京:现代职业安全,2003(4).
- [2] 张文显.法理学[M].4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14.
- [3] 叶龙,李森.安全行为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61.
- [4] 晏宗新.安全生产法制建设问题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7.

(责任编辑:王明雯)